

初之存圖

梁思退夫斯基

——梁思退夫斯基夫人之日記及回想錄

科捷迎斯基原輯英譯

李偉森重譯

一九二七

輯 者 引 言

朵思退夫斯基夫人 (Mme. Dostowsky) 的日記，她的“回想錄”的草稿以及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八一年間她的丈夫給她的信的抄錄稿，在一九二二年都尋得了，完全是夫人的親筆；這些文件由喬治亞（在高加索）教育委員會的代表送給莫斯科文庫的管理員；一九二三年，他們更把她的日記出版了。

她的日記的第一冊是從一八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到六月二十日，第二冊是從同年六月二十二

日到八月二十四日，這一時期中，索思退夫斯基正是旅居在國外——倫敦、荷斯頓和巴爾等地方。

夫人的記載最初都是用的速記法，下面一段便是她在一則日記上面寫的‘速記’：

“此日記係安娜，格里戈里夫娜，索思退夫斯基（Anna Grigorovna Dostoyevsky）借其夫索思退夫斯基（F. M. Dostoyevsky）旅居在國外時記的，從一八六七年四月起，都是用速記法寫的，但抄譯出來，却在二十七年以後，即一八九四年了。”

從第二冊的題記中，我們可以知道那一部份的日記“在一八九七年末，即三十年以後，才抄譯出來；一九〇九年和一九一二年又續抄的。”

夫人的日記與她的“回想錄”完全是不相連屬的；“回想錄”現在也存在中央文庫裏，其大部份已經由俄文印行了。

在夫人“回想錄”的草稿某一篇中，無遺地她的日記的來源如下：

“母親看見我要遠遊國外，她哭得非常厲害。

我也覺得很難過；真的，這是我第一次長遠的離開母親，我有生以來二十年中都是和她很快樂的相依着的。我安慰母親，對她說三個月後我一定回來，在這期間中，我必定常常寫信給她，我允許她，在秋季我必定很詳盡地告訴她，我在國外所遇見的一切關於我個人的有趣味的事，爲了要使這些事不要忘記了，我想最好是用一本日記，每天把我遇見的事都記在裏面。真的，我說了就實行，便在火車站買了一本記事冊，第二天便開始用速記法記下一切我覺得有趣味的事，用這本記事冊，我每天都記一些事物，繼續了一年之久，直到了更嚴重的事臨頭，即是，我要預備分娩，才停止了。

“起初我只記下旅行的印象及敘述日常的生活，但是漸漸的，凡我親愛的丈夫的觀念，談話以及對於文學及音樂等的意見，足以使我感到興趣及神往的，我都要寫下來了。有時我還記載我們的小小的爭辯，我反對他的某項意見，例如，關於婦女問題的，我可以自由地記述；因爲我知道除了我自己，我用縮寫法記下的東西是沒有人

意識得的。

“每逢晚間，費多爾（Fiodor 即萊氏之弟）必讓下作工，我便坐在另一棹旁寫我的日記。幾次費多爾對我說：‘你在那能用那些奇怪的句語描寫些什麼東西，我多麼願意知道呵！你必定是在罵我！’

“‘誰忍罵你呢！’我必定這樣回答他。他時常是用一種戲謔的口吻像這樣回答我的。”

日記的背景是德國，不是俄羅斯。夫人的日記所供給的關於萊氏的材料實在有最高的價值。

夫人的日記用俄文原文印行的是一冊，約有四百頁，一九二三年中央文庫出版的一本書中我們只摘錄了若干篇，這些都是我們認為極有助於更深切了解萊氏的材料。

夫人的“回想錄”的草稿共有大小三十餘冊，其內容之文學的成就亦高下不等。夫人最後寫成的那冊極雅馴的“回想錄”，都是以這些草稿為底本，這是很顯著的。

“回想錄”從一八六六年開始，那時夫人僅

三十歲，這初次與索氏相見，結識是在一九一七年，在布爾什維克前線。

“回憶錄”裏開列了索氏最後十四年生活中的情態，揮毫闡揚，夫人以其實惠的意志，豐富的精力，堅強而靈敏的頭腦與主動的精力，成爲索氏的一個最典型的助手（實在索氏對於實際的營生可以說是「懂什麼的」）。——這在“回憶錄”中都可以明瞭地看出來。

本書所輯的“回憶錄”的第一部份最初是在一種婦女雜誌上登載的（一九二三年），後一部份是從俄文“索恩涅夫斯基夫人回憶錄”中選出的；此書是最近由國家出版公司印行的（一九二五年莫斯科與彼得堡發行）。本書選錄的數篇，我們認爲可以幫助讀者對於索氏得一新的了解。

妻子辟安娜，格里戈里夫娜，索氏之後妻（註一），在索氏最後十四年生活中所佔的重要地位，有幾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必須記在心裏，安娜，格里戈里夫娜（卒於一八四六年）在一八六

六年秋受僱於柔氏，任速記之職，在一極短時期之後，他向她求婚，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他們便結婚了。（她年二十一，他年四十六。）在他們結婚後的整十四年中，安娜是柔氏的速記生，抄寫生，秘書，財政顧問，發行人，發售人和一般的管理者，這些年中是柔氏的文學出產最旺的年份，他所有的著作，一半以上都是在這時期中寫出的，即：賭徒（一八六六年），白癡（一八六七——一八年），永生的丈夫（一八七〇年），魔鬼——英譯作 *The Possessed*（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年），著作家日誌（一八七三——一八七四年），青年——英譯作 *The Raw Youth*（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卡拉馬卓夫兄弟（一八七八——一八八〇年）。

在她的丈夫逝世以後（一八八一年），安娜便專心致志於整理她的丈夫的著作和遺物：在莫斯科歷史博物館中，她特別要求了一部份的地位，專於存放柔氏的無數手稿，記事冊，信件，照片，以及所 俄文與各種外國文論及柔氏的文字，隻字片紙，搜羅無遺，博物院“柔思退夫斯基紀念室”所存放的一切物件，安娜都作有一最

充分的說明，並且印行了一種著作年表，包括了榮氏的全部著作及一切有關於榮氏的文字，她的記述榮氏的生活與活動的“年表提要”共有五千餘條，乃俄文年表中唯一無二的巨製，在她的晚年，安娜的精力與完全消費在整理“回憶錄”的工作，預備在自己身故後出版的。

在俄文本“索思退夫斯基夫人回憶錄”的序言中，編者格洛司曼（Leonid Grossman）曾述及本人會晤夫人時的情形，此時正當夫人逝世之前一年：

“在一九一六至一七年冬季，我在彼得堡會見安娜，格里戈里夫娜數次，革命後我在索司特洛里次克（Sostrotorsk）也會過她。”

“雖然已屆暮年，夫人的心靈仍是保持着極可貴的活氣，她的談話極為娛人，她能夠很長的時間，毫不停歇，談着往事，關於家庭的遺跡，過去的人物，自然特別是關於他，——他乃是她十四年的生活的伴侶，他乃是她現今最為崇敬禮敬的人。”

“‘我並不是生活在二十世紀當中，’她說，‘我是仍舊留在前世紀七十年代裏，我的來賓是費多爾的朋友，我的周圍是榮恩退夫斯基的一般知己，而現在他們都已不在了，我是與他們共同生活着的，每一個研究榮恩退夫斯基的生活或著作的人，對於我都像是近親一般。’”

“夫人認為她一生的工作還有很多沒有定成，‘我七十一歲了，’她說，‘但是我還不想死，時常我相信，我會像我的母親一樣，活到九十歲，還有一大堆工作要作，我一生的工作與勞動，離着成功還遠得很。’”

“這位老夫人，戴着一頂花編草帽，面色雖然衰老，却仍舊有動人的地方，眼光灰色，但極明澈，青年的微笑亦仍舊很好並保存在；有人見訪，只要是十分有興趣於榮氏的著作的人，她必出示她的“回憶錄”的手稿，她個人成功的可珍貴的紀念物以及她丈夫的多量的信件。

“‘在生活中我常常需要一種‘理想’，’夫人接着說下去，‘我曾經常常從事於一些工作，那些工作都是我願意專心致志去幹的，便是我們在高

加索的產業，我要着也是有一種特別目的的，每一個人的生活中，常有一個時候是需要單獨生活的，要把自己從習慣的舊轍中完全移開去，離開每日生活的忙碌，去單獨忍受自己的鬱悶悲哀。好，我想着，讓我的孫兒們有這樣一個庇身的地方吧，當他們處着逆境的時候，讓這地方扶持他們幫助他們吧，我深深地相信，像這樣繼續着實現自己的計劃便是人們得到愉快的唯一道路。不，我不能抱怨——我是嘗到了愉快味道的，有時，我在花園裏坐着，在向晚的寂靜中賞鑑着燦爛的落霞，我自己在心裏問：“上帝！爲什麼你給我這樣一種愉快的生活呢？上帝！爲了這，我怎樣感謝你呀！”自然，我也常遇到痛苦的打擊，最後的一次是比較近日的事，夫人的面色變得沉暗了，當她記起了她老年來最痛苦的事情，她繼續說下去，帶着一種顯然的激奮；‘你可以想像，幾年以前，司特拉可夫（Strakhov）的信公佈出來，給我是怎樣一種可怕的印像！那樣的一封信，在信裏，他說費多爾是陰險狠毒並污人廉潔！我被恐怖與憤怒弄得發抖了，這是怎樣的一種未之前

聞的誹謗呀！這種誹謗從誰的口裏出來的呢？從我們的最好的朋友，從我們的日常的來客，從我們結婚的證婚人——從尼可拉司特拉可夫口裏出來的；在費多爾死後，他的遺著要出版，司特拉可夫還要我允許他為索思退夫斯基作傳哩！倘使司特拉可夫還活着，不管我怎樣衰老，我必定要立刻跑到他那兒去抓他的臉，問他何以這樣卑劣下流！”

“夫人的灰白面頰因憤怒而泛著紅潮，她的眼光中也燃着一種青年的火，聲音裏充滿了悲憤和苦痛，此時這位可愛的老夫人的面貌令人很清楚的記起她青年時的玉照，——波布洛夫（Victor Bobrov）在索思退夫斯基彫刻邊那件的碧青半婦人的肖相；在她的清明的眉宇之下，射出那似劍似火的閃光。”

“那時我決定，倘繼續說，‘不在報紙上作答辯。我對於司特拉可夫的答復將寫在我的回憶錄中，這書將在我死後出版的。我在這本書裏將要更多的說明先夫的人格，杜爾斯泰（Durshtoy）曾經問過：‘索思退夫斯基是哪樣的一個人呀？’”

我答復他：“他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人中之最仁慈的，最和善的，最聰明的，且最豪俠的一個人。”我願意對於每個人重述這句答語。”

“夫人又微笑着告訴我一件事，似乎她認為這件事是很有意思的。”

“‘你知道，馬林斯基戲院正要排演一新歌劇，由一青年主編，以萊思退夫斯基的某一種小說作本事，這位編劇家也不過問一下版權的事，我們質問了他，問題隨後便解決了，可是，上星期日，這位編劇家來訪我，親自承認錯誤，他帶了一本他親手抄寫的曲本給我，同時他要求我在他的“集珍簿”(Album)上面寫幾句話作紀念，拒絕是無用的，我便允許了他的要求，可是當我提起筆的時候，這位青年編劇家却說：“我必須告訴你，安娜，格里戈里夫娜，這本“集珍簿”是完全供獻給太陽的，這裏你只能寫關於太陽的話，”你知道我寫的什麼？……“我的生命的太陽……費多爾·萊思退夫斯基，安娜·萊思退夫斯基。”’

“最後一次我晤見夫人是在革命以後，正當

一九一七年三月的時候，在勃司特洛里夫克她所住的那修養院裏，她指給我看，在廳堂和臥室裏也都有着革命的軍跡。

“‘自然，我們在這裏也知道，’她說，‘彼得堡的事情，可是我們沒有盼望在本地也會發生反響的。就在革命後的第二天或第四天，我從我的住所的窗戶裏，看見有一大羣工人，從勃司特洛里夫克兵工廠裏出來的，正列隊向我們修養院進行——都有武裝，撐着旗幟，彷彿預備圍攻我們的一樣。我們猜不出他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真令我們吃驚了，羣衆竟面向我們的住所奔來；不幾分鐘，我便聽見了樓下一陣緊急的敲門聲，同時步履雜踏，至爲紛亂，我就在我自己的房裏，把門鎖上，很害怕地想着，這一切我所鍾愛的東西，這一切的照片，成堆的手稿，信件和書信，都要逃不了毀滅的命運，不幾分鐘，我聽見了圍牆已經走上了二層樓，羣衆衝過了我的門，高聲談着叫着，又不幾分鐘，我很清楚地聽見，那喧嘩的憤激的羣衆已經圍鎖在我的門外了。我採意了一頁寫着索思退夫斯基名字的信片。他正在我的門上敲了

一下；可是更令我驚異，那敲門聲還是很溫和且很恭謹的聲兒。我向空中畫了十字，便開門，親身對那喧嚷的羣衆說，請他們慈善一點對待我，我這一個老婦人。他們的領袖之一立刻出來安慰我，叫我不必驚恐。他說，“我們知道你是什麼人，我們不會傷害你的，可是我們必須檢視一下你的房間。”真的，他們只是檢視了一下，並沒有搜索。

“‘隨後才知道，工人們是在搜索那藏匿了的前某總長卜洛脫波波夫(Protopopov)，外間謠傳他是藏匿在塞司特洛里次克，隨後證明這謠傳是假的，他們沒有找出卜洛脫波波夫，可是出乎意料以外，他們竟在這裏找出了馬加洛夫(Makarov)，在這修養院裏的人都親眼見到那位馬加洛夫總長企圖藏匿的可憐的哥兒，他呼世的妻子捧着一尊神像出來見那嚴上人，”

“夫人當壯年時期曾經手抄過某氏對於未來的俄羅斯革命之激烈的預言；現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這一偉大的事件，亦從夫人的口中矜靜地且頗有幾分同情地，講出她所聽見的一瞥，我

們聽着，真感到一種新穎的趣味。

“夫人希望長壽，希望活到九十歲，惜遂未能如願，她於一九一八年六月九日在雅爾塔（Yalta）地方逝世，享年七十有二，這位鞠躬盡瘁的工作者，竟未能完成她所計劃着的新工程。

“我從夫人的一位近親方面接到了下面的一篇文章，記述夫人末年生活的情狀頗真，一九一七年五月末，夫人離去莫斯科，到高加索去休夏，她的許多近親都隨她去了，‘在那一年中，那位她的近親寫給我說，‘修桑陶卜司（Tuapse）與亞得勒（Adler）間的鉄路的工程已經達到我們的隣近了，腐爛的爛泥堆在四處，蚊蟲更是雲集着，我們的住處便完全被這些東西弄到不堪了，本地以前是沒有過瘧疾的，此時幾乎全體居民都染瘧疾了，安娜·格里戈里夫娜自然也沒有幸免，當時安娜的兒子費多爾·費采洛維奇正住在高加索的另一部，他懇請安娜移居，安娜便帶了少數親容離開了這傳染病肆虐的地帶，我們走到陶卜司，幾乎都半死了！這種旅行特別使安娜難堪；她的

年齡既已蒼老，身體也衰弱，更加具有病在身，於是她的健康便完全損毀了，華英重復向她襲擊，至於使她失了知覺，陷於半癱瘓的狀態。兩星期以後，她竟復原了，竟能自己繼續行程到雅爾塔去，（此時她的同伴都要到別地方去。）到了冬季，她甚至還想回彼得堡去，可是旅行給與她的變態自然要使她的健康再受極壞的影響，果然，不久我即接到她的信，說她又染了瘧疾，不過症狀尚輕，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她竟十分痊愈了，一九一八年春，德國軍隊向南俄進攻，我們便與莫斯科完全隔離，費多爾·費萊洛維奇當時正住在莫斯科，以前他是時常送點錢給他母親用的。自從交通斷絕以後，安娜便陷於極苦的地步，幾乎不名一錢了，在長期的食物缺乏，有時幾乎竟完全在飢餓之中，六月一日，安娜買得了兩磅麵包，還是濕的，因為漲了，自然她要吃下，當晚她便感到了劇痛，據醫生的診斷，她的腸裏正在極高度地發炎，她的朋友中有一位女醫生，那見了她的病狀，便爲她僱了一個看護婦；這看護婦看護她在到臨終，六月五日，看護發出快信給她

的近訊，報告她的病狀已臨危境；可是因為當時郵政的阻滯，此信竟久未遞到。六月七日，安娜已經失了知覺，又經過了兩天的劇痛，六月九日上午十一時，她便去世了，她的遺體最先暫厝於教堂下的墓地；她的兒子到了以後，便將她安葬在教堂的近處，萊思退夫斯基的這位最傾心的朋友，便在這樣的一種愁苦的，完全孤獨的，沒有兒孫亦沒有近親在身旁，而是極端貧窮的景境當中，完結了她七十三歲的生命！我們的文豪在世的時候，她爲了給與他以愉快，逝世後，她爲了顯揚他的聲名，安娜·格里戈里夫娜完全犧牲了她的一生以赴之，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哩！”

（註一）萊思退夫斯基的前妻是寡婦馬里·德米特里夫娜·伊沙也夫（Murio Dmitrovna Issayev），他適於一八五七年二月在庫斯涅次克（Kuznetsk）結婚的，那時萊氏還在西伯利亞挨他的苦生計，馬利逝世於一八六四年四月十六日。